

尴尬的“夹心饼”： 求职大战中的研究生

“公司的设计项目只放手给博士生做，下工地锻炼打杂我也不乐意去，高不成低不就的，太尴尬了。”北京市某高校建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黄肖在重庆市紧缺人才招聘会上转了一上午，和多家用人单位都谈不拢，最后只投出了一份简历。

尽管已经拿到了两家建筑公司的 offer，但黄肖仍忙于在网上投简历和奔走于各大招聘会。

“这两家单位我都没打算去，工作太差了。一家是跟本科生一起下工地，一家是要我先在设计师打杂，这些体力活儿我本科毕业就能干，现在还下工地，这个硕士不是白读了。”

专业硕士生求职遇冷

“以前硕士毕业的师兄师姐，都能在设计院或大型企业设计部门找到好工作，我也一直自信能有个不错的出路。”黄肖三年前选择再读个硕士，就是奔着这个目标。

找了近四个月后，黄肖渐渐发现现实与理想差距越来越大。“找了这么多企业才发现，我们专业的硕士生和本科生待遇基本没两样。早知道这样，还花好几年读这个硕士干什么！”

黄肖觉得，研究生在建筑设计这个行业里，就像一个夹心饼，被本科生和本科生夹在中间，高端设计企业不信任，不让做，低端基层的工作自己也不愿去做。

招聘会上，像黄肖一样遭遇这种“夹心饼”瓶颈的硕士生不在少数，大部分集中在技术型的专业。

就读于吉林某高校生物工程专业的硕士生王蕊蕊，自去年9月以来，“投了上百份简历，参加了几十场招聘会，被拒了无数次。”

王蕊蕊参加过某国际化妆品公司的招聘，申请的职位是公司最基层的柜台销售，和她一起申请的还有一位本科师妹。

“我想申请一个对学历要求较低的职位，以我的专业和学历优势，应该是胜券在握了吧。”可是王蕊蕊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公司最终以“用人成本过高”为由拒绝了她的申请。

这次求职经历让王蕊蕊备受打击，彻底放弃了找工作的念头：“我已经将期望值降到最低，却连个站柜台的机会都得不到。”

王蕊蕊班里二十几个同学，大部分都有类似的经历，几个成功就业的，都做了医药代表，实际的工作就是每天打电话向各医院推销药品。

无法改变现实就改变自己

吉林大学医学院的硕士生张乘在经历几个月的求职挫败后，做出了决定：读博。

“我是学临床的，本科毕业只能去社区医疗机构，不甘心就考了研，读完了才发现，现在的大医院只要博士了。”张乘摊手，很无奈。

“虽然以前觉得读博耽误青春，但在当前形势下，读个更高的学历还是必要的，不管学到了什么、关键是用人单位喜欢！”张乘觉得，读博未尝不是一种暂缓压力的出路，“还能有比博士更高的学历吗？我就不信到时候找不到好工作。”

天津某大学医学专业的硕士生陈博在同学眼里是个幸运儿，因为他顺利地拿到了一家知名快速消费品公司的 offer。“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做个医生，原本以为读个硕士学历够了，求职时才发现比不过博士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现实，我只好改变自己了。”陈博仔细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发现自己性格外向、思维敏捷，那些需要与人打交道的工作适合自己，于是很快地把注意力从医疗行业转移到快速消费品等行业，“医生或许需要很强的专业技能，但是有的行业和岗位会更注重人综合素质。”陆续收到了几个 offer 后，陈博最终选择了现在的这家公司。

他也在学校 BBS 上被列为职场牛人，可是他一点都不以为然。“我觉得我的优势在于学历和专业，比起本科生我的思想更为成熟，医学这个专业看起来和现在的职位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可以帮助我从人体健康的角度理解我要销售的产品，增加客户对我的信任感。”

“虽然现在走的路，和梦想中的不一样，但是适合我。”陈博觉得，“每个专业不仅培养专业技能，还培养思维方式，一条路走不通，就换另一条路，求职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

考虑深造或者基层就业

“我们这种技术性较强的单位，产品设计和研发一定要由技术过硬的人负责，刚毕业的硕士生显然达不到要求。而车间和基层的工作，本科生甚至大专生就可以做，又用不着研究生。而且，待遇低了他们不愿意干，多给钱吧，他们又很难研发出我们需要的东西来。”重庆某国有大型企业人力资源部部长刘亚尼说出了他的看法，他们企业也曾经招聘过硕士生，但这些硕士生来了往往不安心在车间锻炼，在试用期中就显得很浮躁。

“硕士生到基层锻炼是很可取的，工作经验对于技术行业来讲非常重要。可能刚进单位跟本科生、专科生干的活儿一样，可时间一长高学历的优势自然会体现出来。”重庆长征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叶纪隆建议硕士生们，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不要拘泥于眼前的起点。

继续深造也是一条出路。“医生和其他行业不一样，尤其是临床医学，你技术不过硬，患者怎么敢让你来治病。特别是大医院现在都是医疗、教学和科研一体，没有高学历根本没有办法胜任。”胡仰明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助理，建议医学院的学生有条件的都应该继续深造。他拿着一份清华大学医学院博士生的简历对记者说：“像这种学历的学生2010年才毕业，而我们现在就明确表示接收。”

据《中国青年报》

“职业粉丝”有工资： 粉丝团追星的背后



阿娇日前复出 数十粉丝到场力挺

在机场亲眼见过粉丝团狂热追星的场面后，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陈放一个劲地摇头：“那天是工作日，一群孩子课也不上，就跑去机场接他们心中的偶像，实在是搞不懂！”

陈放说，他还见到过一次家长跟着孩子一起追星的场面。孩子看到明星就追，家长跟在孩子后面跑，手里拿着大包小包。一问，原来，孩子执意要跟粉丝团追星，家长不放心，就跟来了，顺便还要承担给孩子与明星合影的任务。

近来，不断有媒体报道，有明星花钱雇用“职业粉丝”，专职组织粉丝团成员通过各种手段为其宣传造势。一个网名叫“扎辫子”的杭州“职业粉丝”甚至为粉丝团制定了报酬标准：“偶像吻一下，泪流满面100元，如果选手晋级，再加奖金。”

一位刚刚加入某男孩组合粉丝团的初中生告诉记者，一般称得上“职业粉丝”的，都是一些大学生。他们“级别比较高”，与明星经纪人团队走得近，能得到免费的明星签名海报、演唱会入场券、歌友会信息等；而像自己这样的小粉丝，只有掏钱参加活动的份儿，“搞一次活动，要买统一的广告衫、荧光棒；另外，交通费、海报和灯牌制作费、追星用的打车费等都要平摊。”

据了解，“职业粉丝”不仅能从明星那里拿到“工资”，还能从粉丝团日常活动经费中赚取“差价”，而粉丝团成员绝大部分为正在念初中、高中甚至小学的学生。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党组书记书记张世平认为，明星花钱雇用“职业粉丝”，再由“职业粉丝”鼓动小粉丝去追星的行为缺乏公德，“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取缔这种行为。社会的引导宣传，不要把歌星、影星、明星捧得太高，要客观地描述和评价。”

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李少卿曾长期从事青少年权益保护工作。他说，如果被“组织”的小粉丝是未成年人，那么，“即使小粉丝的行为都是自发自愿的，考虑到未成年人不成熟的特性，真正有社会责任感的明星，是不应该鼓励或者蓄意组织粉丝团来炒作自己的，否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权去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记者专门就此咨询了相关的法律专家。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所助理研究员郭开元指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上述行为虽然不构成犯罪，但未成年人享有发展权（其中包括受教育权），且发展权优先于未成年人社会参与权，“所以，如果未成年人因为追星不去上课，那就有问题了。”

“青少年追星是学生在文化传播‘泛娱乐化’和学校应试教育两股拉力下诞生的产物。”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王东林说，现在一些选秀节目趣味低俗，一味地以互相逗笑、丑闻吸引观众眼球，拉动广告收入，这类节目占据

了大部分的黄金时间段，“这种节目宣扬的是一种突然从平民到明星的‘神话’，会误导孩子，以为成名很容易。”

据百度与北京大学共同创立的中国人搜索行为研究中心一份名为《2007中国电视选秀节目研究》的报告称，选秀节目观众群体具有年龄小、学历低、学生比例高、女性比例高的特点；选秀节目的拥护者，以初中生和高中生群体为主。

全国政协委员、歌手韩红告诉记者，“职业粉丝”最早是从一些选秀节目中产生的，明星为了炒作自己花钱雇“职业粉丝”的行为“太自私”，“明星应该以身作则，毕竟你已经是大家关注的公众人物，应该给喜欢你的孩子们作出榜样，引导他们朝好的方向去发展。”

王东林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选秀类电视节目的监管，“能不能减少播放频率，或者不要在黄金时段播放。”

除了文化传播的“泛娱乐化”，王东林认为，我国的应试教育体制也是青少年追星的一大诱因，“孩子上了一天学回来，心里厌烦得不得了，孩子不喜欢学校，叛逆得严重的就去外面追星。”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盐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进盐城市委主委马成志建议相关部委加强对中小学校体育、劳动课、美术课、德育课程的监管力度，把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学校的引导非常重要，你要让孩子们有娱乐的地方，不能把他们关在教室里死读书。”

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罗梅分管少先队工作，她指出，针对目前青少年追星的现实情况，团组织正在尝试通过树立一些青少年所喜爱的、积极向上的、富有活力的明星典型，来加强对青少年的引导和教育，“如果挑选一些孩子们喜爱的明星，让他们来给孩子做榜样，告诉孩子们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这比我们大人单方面地灌输要用的多。”

罗梅告诉记者，在前不久刚刚召开的全国少工委五届五次全会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也就青少年追星问题谈过一些看法并提出要求说，要发挥互联网和新媒体的作用，通过儿歌、游戏等儿童感兴趣的方式，借助一些形象健康的明星的影响力，来加强团组织对少年儿童的影响和引导。

据《中国青年报》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szxw@znews.com

时政点击

期待教育部门能够从善如流

河南是人口大省，但是在现有高考录取体制中，河南的考生却遭到制度性不公平待遇。针对这种情况，去年，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建议案”，但教育部的答复不能让他们满意。在今年全国人代会上，代表们直接提出“批评案”，他们表示，如果高考制度不公现象今年仍未有改变，明年他们将直接提出“质询案”或“罢免案”。

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的努力值得尊敬。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目前教育体制的一个重大弊端。作为人口大省、高考大省，这种不公在河南体现得极为尖锐。例如，过去两年，北京的高考考生人数是河南考生人数的12%左右，而北京大学在北京投放的招生人数是河南的3.7倍左右，清华大学则在4倍以上。

近些年来，这种教育不公现象不仅未见缓解，反而趋于严重。连温家宝总理也曾感叹，农村考生上大学、上京沪等地名牌大学的比例日趋下降。

不过，人们仍找不到一个切实有效地解决此问题的途径。教育资源的这种分配不公，本来就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长期执行的一项政策。行政部门总是有自己的逻辑，基于任何一个行政机构都有不可避免的惰性，它往往没有动力主动改变既有政策。但是，整个教育资源的分配本身完全是行政主导，所以，行政部门不调整政策，就无法改变目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格局。

于是，改变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格局的关键就在于，社会中出现一种强有力的力量，推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不得不作出变革。河南省全国人大代表的努力，表明这种力量正在形成，并且可以预料，只要代表们坚持不懈，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

首先，人大代表具有这方面的动力。制度变革总是需要一定的激励，惟有当人们意识到变革能够给自己带来收益的时候，他们才会作出持续的努力。很显然，像河南、江西、山东这些高考大省的人大代表，要求改变高考录取分配名额的努力，将立刻给乡梓学子带来收益。这种可以预见的收益驱动人大代表付出努力。

有些人可能有疑问，在他们看来，全国人大代表就该超然地议论国家大事，而不应赤裸裸地追求一地的利益。然而，现代政治既要求代表理性地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同时也不排斥代表们代表本地民众利益，在立法、决策过程中保护和增进局部利益。事实上，考虑到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严重性，地方人大代表要求改变这种局面的努力，显然同时也在国家层面上，增进整体的公共利益。

其次，人大会议也是能够真正触动行政管理部门的舞台。按照宪法，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家行政管理部门的一切活动理应符合全国人大的控制与监督。而且，法律也赋予全国人大代表以行使这种控制与监督权的机制，就如河南的全国人大代表所说，如果教育部的答复不能代表民意，可以提交“质询案”，甚至提出“罢免案”，迫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采取改变教育不公状况的有效措施。当然，人大代表也可以利用其他渠道控制与监督教育资源分配，尤其是预算。

此前有代表曾质疑议案回复率虽高，但实际效果并不彰显。这一方面源于一些部门的敷衍了事，同时，也与人大代表不充分尽责有关。如果只是提过议案了事，不一追到底，议案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期待教育部门能够从善如流，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综合评估代表的意见，进行实际改革。

秋风

取消高考的建议，眼下还是免谈吧

“取消高考将是一个灾难”——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的预言，相信也是多数国人的预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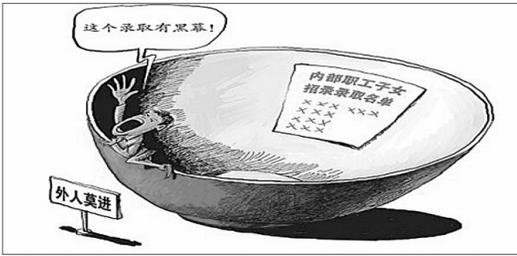
因为，预言中的灾难，在“高考改良版”的自主招生中就已见雏形。李校长指出，虽然的确有一些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通过自主招生免试入学，但混杂其中走后门的，也不乏其人。“说白了，还是社会诚信不足”，自主招生成了某些分数不够的学生“曲线”进入高校的一个手段。假如真的彻底取消高考，导致的不仅是教育灾难，更会彻底动摇国人对“公平”的最后信心。

在现有的“诚信水平”下，在各种“潜规则”通行

无阻的今天，完全可以预言：假如像一些外国那样以中学平时成绩包括做义工情况作录取依据，我们的中学，完全可能成为造假大本营；假如录取指标不分到各省，而是全国统录，高考作弊，完全可能演变为“有计划有组织”。

凭分数录取的高考，的确是应试教育最大的“毒源”。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恰如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所说的，还没有更好、更完善的渠道。如：教育是毒药却不得不吃，“饮鸩止渴”，是无奈，也是悲哀。任何取消高考的建议，眼下还是免谈吧。

新闻



漫画：内部招工

一次11人参加的辽源供电公司内部职工子女招录考试中，录取5人，其中4人并列第二名，而且满分为200分的试卷成绩完全相同。有考生家长质疑这种巧合，并找到相关部门。结果经再次核分后，4名同分的考生变成了两名，这让考生家长对这次考试的真实性更加怀疑。

华文

看病难报销与医保基金睡大觉

“医保基金大量结余情况不正常，为地方和部门挪用制造机会。”3月9日，全国政协委员、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表示，“如果这笔钱结余太多，那么就证明地方政府失职。”据悉，2007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当期的结余率是34.8%，2008年是32.8%，“这个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控制在10%以下的水平。”（《华商报》3月10日）

一边是长期困扰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一边却是专门用于医疗保障的医保基金被大量结余、闲置——“花不出去”。按目前的社保管理体制，地方政府正是包括医保基金在内的主要社保基金的直接管理者和责任人，如果医保基金不能充分足额地花在参保者的医疗卫生需求上，地方政府显然难辞其咎。

若更深一层剖析，“医保基金大量结余”所能证明的其实不只是“地方政府失职”，同时也是政府职能的错位。因为，从世界其他许多社保事业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直接参与、置身于医保基金的具体管理经营，原本就不该是现代政府应有的职能。如美国的医保基金，其专门的管理委员会独立于美国政府，只对议会负责。对一个科学、健全、有效的医保基金管理体制而

言，“独立于政府之外”如由基金的主人、受益人——参保民众委托中立的专业社会机构、进行独立的第三方管理，本便是其最为核心的管理特征和品质。

目前在中国，充分尊重民众和社会“中介机构”本身自治能力、确保政府职能不错位和越位的公共治理生态，还远未真正建立起来。如在社保基金的管理问题上，当前地方政府所处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就相当混乱不清，往往既是基金监管者，又是它的委托人，既是基金的投资人，又是直接的资产管理人。在这种职能职责的错位混乱之下，社保基金的合理高效利用几乎成为不可能，频繁出现诸如“大量结余”、“挪用”、“管理成本高昂”、“收益率低下”等不正常的社保基金管理怪相、乱象，当然不足为怪，也不可避免。

既然社保基金的管理原本就是政府不该管，并且实践证明也是它不可能管好的事情，那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像“大量结余”、“挪用”这类现象，除了指责政府失职外，何不干脆彻底地剥离给政府这一越俎代庖而获得的“职能”，将包括医保基金在内的社保基金的政府主导的现行管理模式，彻底转变到独立、中立、专业的社会化管理轨道上来呢？

就业不公比岗位稀缺更招人怨

就业难。从扩招后的首届大学生毕业至今，情况一直没发生根本改变，加之又赶上经济寒冬，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后果是什么，不需要多讲；应对办法也看到不少，可是解决实际问题不多。好多思路是奔着“救急”去的，像什么设学士后、延长就读年限、多招研究生之类。这种方法，眼下可以“劝退”一部分就业大军，可他们最终还得走向社会，难不成让他们永远不毕业？并且，教育有自己的目标和规律，它不完全为就业服务，大学太过功利化，对学生对社会都没好处。

就业难完全怪罪于扩招，并不客观。不扩招也存在就业难，只不过那时候是中学生不好找工作，大家不以为然。况且，多些大学生，也不是坏事，提升国民的教育程度，当是一个国家发展之目标。批评大学的专业设置完全和社会需求不接轨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没有哪个国家的大学专业，完全和社会需求一致。即便很注重实用性，也注定会有一些专业，像哲学、理论物理之类，面临就业难。莫非大学就不设这些专业了？其实，将就业率与大学挂钩，是件挺搞笑的事儿，见过哪个国际一流大学，将“学生都找到工作”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我倒觉得，大学要教给学生的，不是某类专业知识，而是知识素养和学习能力。素质教育说白了，就是培养人而非专业。基本素养和学习能力，方是立身之本。我们这里讲就业率，除了逼着一些大学调整专业方向之外，主要是给家长和学一个交待。毕竟，读大学是“要紧”的事，这里面既有“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更有大学学费之不菲，高投入期待着高回报。

至于“转变就业观念”，用不着校长们去呼吁，现实由不得大学生不放下身段。依然会有眼高手低者，砸几次壁，自然知道调整。北大才子不都去卖肉了，自食其力有什么丢人？所谓的观念转变，不过是别指望一劳永逸，有份工作先干着，骑驴找马。

要让更多人找到工作，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扩大就业岗位。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编制放在那里，要扩编不容易，也不可能让更多人去“坐机关”。有潜力的是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要知道，中国中小企业创造出了65%的就业岗位——在吸纳75%的城镇就业人口的同时，还为75%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经济危机，倒闭的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这也是失业人口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我们现行的政策，在诸多方面缺少对中小企业的扶助。实际上，国企一家独大的情况，既制造了垄断，也阻碍了公平的市场竞争。为中小企业解困，不失为保就业的良方。

另外，更重要的是确保就业的公平性。越是就业难，权力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就业中的种种歧视和不公正，比岗位稀缺更招人怨。一旦存在暗箱操作，就算是落选者“技不如人”，也有不满和怨怒的理由。而那些五花八门的歧视（性别、身高、乙肝、学历等等），更是人为地加大了就业难度。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被剥夺感和对社会的不满，这远比找不到工作更有杀伤力。

冯雪梅